

北京市东城区 文史资料选编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市东城区文史 资料选编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11

目 录

回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 (1)
一位热爱中国的法国妇女——何宜文夫人·····	万永光 (12)
日伪统治下的师大女校·····	关沫然 刘耀祖 (18)
“七七”事变后的孔德学校中学部·····	钱秉雄 (24)
那家花园话旧·····	张寿崇 (31)
中华近代邮政史话·····	赵乃基 (40)
王府井杂记·····	吴逸民 米永一 (46)
北京市服装业皮货服装类型与建华皮货服装店·····	张惠林 (61)
王府井地区时装行业的形成与发展·····	董金甫 (72)
东城区——北京历史上的文化中心·····	靳 麟 (84)
记慕贞女校·····	马 燕 (105)
贝满女中·····	李爽麟 蒋 雯 (119)
体育界的先驱——李如松先生	

.....	李振东 (李保罗)	(141)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与杨崇瑞校长.....	傅 惠	(148)
忆北京市第一护士学校.....	李 维 高爱芳	(161)
正阳门城垣改建史话.....	朱海北	(175)
美国驻华公使康克夫人家书摘译——		
义和团事件前后的北京见闻(二)...	李寿朋译	(178)
我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吕芝山	(234)

回忆父亲钱玄同

钱秉雄

我的父亲钱玄同先生逝世已54年了。父亲去世时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中。1939年1月17日傍晚，我工作完毕从孔德学校回到家里，父亲正在南屋他的书房中翻阅书报。见我回来，他放下书报问我学校和外面的情况。当时，北平在日伪统治之下极为混乱。父亲由于患高血压身体衰弱，不能离平。他看着自己的朋友们能走的都走了，心中很是郁闷，也感到寂寞，总希望有人来谈谈。那时只有他的老学生戴夏、赵荫棠等常来看他，和他谈一些见闻。

吃晚饭时，父亲从南屋走到北屋中间屋来，母亲让他一同吃饭，他说：“你们先吃罢，我在藤椅上躺一会儿，稍微休息一下再吃。”他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谁也没有在意。他躺了一些时候，又站起来向母亲的寝室（寝室门上挂着有1934年父亲亲笔题的“恒悦庐”三个字的镜框）走去。母亲见他要进寝室，想到她下午出门归来换下的衣服还散放在床上，就赶紧放下饭碗走进寝室。这时，我听母亲惊叫：“不好了，快来！”我进去一看，父亲两眼发直，嘴角上流出白沫子。我们怎么喊，他也不答应，他已神志不清了。我们把他平放在床上，急请医生来看。医生打针后嘱送医院抢救。我们又叫来急救车把他送往德国医院。经诊断，他患的是脑溢血，大夫们极力抢救了几个小时，可他始终没有醒

过来。晚上9时45分，父亲停止了呼吸，病故于医院中。父亲那年刚过52周岁。他去世得这么早，这么急，这么快，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写下遗书，真叫人想不到，真让人难以忘怀。每当想到父亲的死，我就不由得想起他的一些往事，现记下一一些片断。

(一)

父亲常对我们弟兄说：我们家是清寒之家，无房无地，只有靠双手和大脑去劳动才能生活。他在致友人书中曾写道：“原住湖州南门外之鲍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坟墓在该浜之中。”从这信里，也可以看出，我家直到父亲的祖父时才不种田，不打鱼，成为读书人家庭的。

父亲的原籍虽是浙江吴兴，但因祖父振常先生为清朝同治年间丁卯科举人，曾任礼部主事，晚年又在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任书院院长，所以父亲从小生长在苏州。祖父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长子名恂号念劬，是清末的一个外交官。我的这位伯父和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俩相差34岁。父亲是庶出。我的生祖母是四川人，22岁嫁过来，36岁才生我父亲。祖父对我的祖母很严，在封建家庭中，女子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祖母经常受压，受气。因此，父亲非常怀念他的母亲。

父亲出生时，祖父已62岁了。祖父晚年得子，对父亲督教甚严。又因我伯父未中举人，祖父盼父亲将来能正途出身之心更切。所以，父亲刚刚4岁，祖父就亲自教他读《尔雅》。祖父把《尔雅》中的字，写成一条条的，贴在书架上，让父亲站着背诵。有时他站立过久了，两腿僵直，不能走路，不得不由仆人抱回上

房去。4岁的小孩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封建教育真是戕害青少年！父亲和他同年龄人相比，脚力很差。他一生都不能走远路，运动、打球更是办不到的。他在工作之余的活动，只是找朋友聊聊天，或到中央公园的长美轩、春明馆茶桌上看看报。每当身体不适时，他就去澡堂中洗盆浴以消除疲劳。这是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养成的习惯。

父亲6岁从塾师读《诗经》，8岁开始识《说文解字》的部首，15岁前，“十三经”读了十一经半。他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当然要参加科举考试，可16岁时因丁母忧只得作罢。我看，这倒是救了父亲。祖母去世后，父亲才得到一些自由，能和朋友往来了。那时他看了《新民丛报》、《清议报》等，读了梁启超宣传保皇的一些文章，很高兴，颇受其影响，有了“尊清”的思想，但他只是对载湉个人有好感，对那拉氏则认为该杀。

父亲17岁那年冬天，一位家乡的朋友方青箱先生送给他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容先生的《革命军》。他读完这两部书后，立即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惊异感，书中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文章中许多激烈的论调和新名词，特别是对清政府的揭露和痛斥，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动，原来清政府竟是这样的腐败！他原先的“尊清”思想由此被根本动摇了。他对章、邹两位先生的革命言论非常信服，他说：“实在是有道理啊！”后来他又陆续看了《浙江潮》、《江苏》、《汉声》、《黄帝魂》、《警世钟》、《呛书》、《攘书》等提倡革命的书报。他认定“满清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非得革命不可！”为了表示“义不帝清”，誓与清廷决裂之志，18岁那年（1904）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他毅然决然地剪去了辫子。

他19岁时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同年12月伯父约他到日本东

京去观光，也是让他认识认识外国的情况，引导他到日本去留学。伯父是在1898年祖父去世后，把他的全家搬到日本东京去的，他那时是我国湖北省驻日本的留学生监督。1906年春天，父亲奉兄命归国与母亲在上海结婚。同年秋天他又回到日本东京，考入早稻田大学学师范。

父亲留学日本期间，得见章太炎先生。他对章氏的思想学问极为崇拜，认为章太炎先生是做人的模范，遂对章氏执弟子礼。他曾用小篆体为章氏抄写《小学答问》，深得章太炎先生好评。父亲因受章氏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07年加入了同盟会，但后来未参加国民党。他在日本东京参加过为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开的追悼会。他还和章氏一起办过《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是向大众灌输文字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常识，也带有提倡民族革命的含意。所刊文章篇篇都是白话文，父亲的笔名是“浑然”。

(二)

1913年的春天，我刚5岁。我家住在杭州大东门直街一所两层楼的房子中，有父、母、二弟秉弘和我。一天，我伯父从北京回来，要把我先带到北京去。其用意是催促父亲早日结束在杭州教育司的工作北上。父亲虽然同意去北京，但还要对杭州这个家做个安排。那时母亲已怀孕，父亲只得先送她到绍兴外祖父家中去住一年半载。4月初，伯父、伯母带着我乘火车由杭州到上海，又乘海轮北上。我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对在甲板上看日落日出感到新奇有趣。到北京后，我们住在西北石老娘胡同中的一所大房子中。伯父母待我很好，上公园总带着我。平日伯母还教我识字，读《古诗十九首》等。可就是没有个

伙伴玩儿，偌大个院子中只有我一个小孩子，真是寂寞！盼呀盼，盼到秋天父亲才来。他和我住在过厅的两间房中。

那时父亲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任国文教员。他和附中的同事张少元最谈得来。张先生给他介绍了不少北京的情况。另外他还常和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马幼渔、沈尹默、沈兼士、朱述先诸先生往来。记得我上中学后，父亲曾谈起他来北京时的思想情况。他说：“说句实话，当时我是极不愿到北方来，觉得北京是清王朝封建腐败势力的老巢，又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统治着的地方，极其专制蛮横，哪有什么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气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计划在这里是实行不通的，乌烟瘴气得很！那时我只想在杭州浙江图书馆中找个工作，人地都相宜。”但是父亲那时对谋生之难也深有感触。旧社会是一朝君来一朝臣。父亲所在的杭州教育司长官换了人，其手下之人当然也要更换。既有伯父约他到北京设法为他寻找工作。他也就答应了。没想到父亲到北京以后，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喜欢北京的气候，这儿没有江浙那样潮湿，他的朋友也愈来愈多了。他喜欢北京的旧书店、旧书摊。尤其是每年春节的厂甸，更是吸引他。他能在这儿买到平日少见的清末、辛亥革命前后的书刊。他很爱逛厂甸，因而有人戏称他为“厂甸巡阅使”。他在北京住了20多年，没有去过比天津更远的地方。他除在学校教课外，就是看书报，写文章，与旧思想、旧习惯势力作斗争。

我三强，到了1914年的秋天，父亲把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北京来，三强还不到一岁，我能回到自己家，能见着妈妈了，真高兴。那时父亲在东华门北河沿北头叫做北箭亭子的地方租了一所房子，前后两个院，共有十几间房。后院有三间房是父亲的书房。他常在晚饭后，拿着一盏煤油灯走到书房中去看书编讲义，直到

深夜才回来睡觉。他白天课毕爱找朋友谈话讨论问题或约稿。他喜爱晚间读书。他常说夜深人静正是思考问题、写文章最好的时候。所以他不愿把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第一、二节。

我们在北箭亭子住了不到两年(四弟秉东是在这里出生的),到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要做皇帝时,我的外祖父在天津租界里租好了房子,命我们全家去避难。我们在天津住了半年多,又回北京,搬到了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这处房子虽是两个院落,但与房东合住,总是不太方便,父亲就在高师教职员宿舍中要了一间房子。有时他就干脆住在那里。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在孙伏园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杂文,都是在宿舍里写的。他虽嫌家中孩子多、乱、不安静,不在家中工作,但每天等我们上学去了,他一定来家看看,和母亲谈谈。他是极关心家里的。其实,高师宿舍就在大沟沿,和我家只隔着一条胡同。可那时我们一个星期至多能见着父亲一次,有时半个月也见不着他。

我的四弟1岁多时,因传染上猩红热病故了,父母都哭得很伤心。就在那年腊月,我家从香炉营头条搬到了西北园。二弟10岁因患肺病,医治无效死亡,我家又从琉璃厂西北园搬到东城赵堂子胡同。我们家在北京住了20多年,搬了七次家,原因总起来不外乎三种:一,逃难;二,子女因病死亡;三,为子女就近读书。父亲很少考虑自己,他常坐着车东、西、南、北城的跑来跑去。

父亲和蔡元培先生关系很深。他积极参加了由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的开办和教育改革工作。他最早帮着孔德学校的教师学习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后来又大力推行国语罗马字母(即注音符号第二式,蔡元培先生做大学院院长时批准公布的);

他还帮着编写高小的白话文课本。到了20年代中期，他就从高师教职员宿舍搬到东华门北河沿孔德学校去住。他的宿舍在东小院槐树下的两间东房中，和当时任孔德学校教务主任的马隅卿先生同住一个院落。

父亲的这两间房是两间相通的小房。总共二十四五平方米。房间布置得很是特别。门是向西开的，一进门靠北墙分两摞放着6个书箱，书箱对面放着6个书架子，中间留下能过一个人的通道，靠南墙放着一张单人床，东窗下放着一张三屉桌和两把藤椅等。父亲在这两间屋中度过了十三四个寒暑，直到晚年才回家去住。他为何愿住在这里？第一，他可以不受家里搬家的影响；第二，他和马隅卿先生很熟，很谈得来。马先生宿舍的外间是办公室。马先生的办公室，课后就是“群言堂”，熟人们常到这里来会面、谈话。鲁迅先生就曾在这“群言堂”中看孔德图书馆购买的小说。奉鲁联军进北京时，父亲在“群言堂”的大沙发上睡过两夜。在时局急剧变化的时候，这里的消息也比较多。所以父亲很愿意住在这里。

(三)

父亲从来不给自己做生日。每到生日那天，他只是照张像留念。记得他40岁那年，那些往来至密的朋友要为他做生日，被他拒绝了，父亲的娱乐，真是少得很。我只记得他带我去看过师大学生演的话剧和新话剧提倡者在协和礼堂演的话剧。父亲不看电影，我们约他和母亲去看电影时，他总说：“我看家。”

他精神好的时候，总要做两套西装或中山服。1925年夏初，他做了两套白帆布的中山服。他做西装非用清河呢厂的粗人字呢

不可。裁缝说，这个料子的价钱不比洋货呢便宜。他说：“我不在乎，我是中国人，就要穿本国工厂织的呢绒。”

“五卅”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都沸腾起来。6月10日，北京的人民在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会后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孔德学校的师生参加了大会。父亲和孔德学校的教务主任马隅卿先生、教师常维钧先生，同学生一起出去散发传单，走到王府井大街遇雨而归。我们这些学生直到游行完毕才归来，淋得象落汤鸡，可大家依然精神焕发。

1925年5月中旬，晏阳初先生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组织“平民文学委员会”。开成立会那天，到会的有庄泽宣、高仁山、林语堂、黎劭西、刘廷芳诸先生。胡适先生因事未到。会上推举胡适为委员长，父亲为副委员长。据说后来还拍了影片，向外宣传。

父亲对他喜爱的工作，总是不辞辛苦地去干。记得溥仪出宫后，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的文物。父亲是善后委员会约去参加点查文物的一个组长。他每天清查回来洗过脸后，就和我们谈他做的事情。虽然很累，还是谈锋甚健，直谈到“我要沐浴去了”才作罢。我们由此知道，他对这一工作是特别感兴趣的。

(四)

1925年6月初，孙伏园先生介绍父亲到《京报》办《国语周刊》，这是父亲求之不得的事情。研究国语的人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怎能不令他高兴呢？《国语周刊》第一期是6月14日出版。父亲在《发刊辞》中说：“这个刊物是黎劭西先生和我

所办的。我们因为对于国语，自己有话要讲，又因为国语上应该讨论研究的问题很多，所以办这个周刊做咱们大家发表关于国语的言论的机关。我们自己要讲的话也不少，现在先说三个要点：

①我们相信这几年来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国民才能彼此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达。所以我们对于最近古文和学校的文言课本阴谋复辟，认为有扑灭的必要……②我们相信真正的国语应该以民众的活语言为基础……所以我们对于现在那种由古文蜕化的国语，认为不能满足，我们要根据活语言来建立新国语。

③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今后之为存为亡，全靠民众之觉醒与否；而唤醒民众实为知识阶层唯一的使命。这回帝国主义者英吉利和日本在上海屠杀咱们的学生和工人的事件发生，我们更感到‘祸至之无日’，唤醒民众之万不容再缓。讲到唤醒民众，必须用民众的活语言和文艺，才能使他们真切地了解……我们要仔细地搜集考察民众的语言和文艺的真髓，用它来建设种种新的民众文艺。”父亲约了十四五位对国语有研究兴趣的人，如胡适之、林语堂、周凯明、黎劭西、魏建功、萧家霖、杜阿力、李遇安、董渭川、苏耀祖等为基本队伍办《国语周刊》。每期他都自己编排，自己送稿到印刷局排印，还亲自校对。虽然工作很累，可他兴趣盎然，不感到疲劳。

他在1925年9月5日的北京国语运动大会上做了五分钟的演说。题目是“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是针对当时“学士大夫”们拼命开倒车，要在小学里搞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复古活动而发的。其中有些警句说得好，如：“明明是鲜灵活跳的活人，可是，不许用现在的语言做成活泼自由的文学”。“逼住活人假扮死尸（按：指硬用二千年前繁杂晦涩的古文来写

东西，弄得辞不达意），您瞧！这够多么可怜！够多么倒霉！”

父亲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想法远在日本留学时就有了。他深深感到中国汉字的难认难学，尤其是古文，非短时期能学好应用。他看到20世纪初的日本，妇人、小孩都能读报写信。这是因为汉字旁都有假名注音，他们认识假名，又语文统一，所以文字比较容易普及。中国文盲这么多，固然是由于教育未普及，但是汉字的难认难写何尝不是一个原因呢！所以他对封建遗老遗少们复古读经的滥调恨透了。他毕生研究中国文字音韵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他曾提出“不要汉字”实际上不可能。于是他又提出简化汉字。他认为将来总要走拼音这条道路。在父亲和“数人会”^①朋友们的努力之下，“国语罗马字”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国语罗马字”经研究改进就成了现在的“汉语拼音”。

当时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不肯公布父亲和“数人会”同仁们共同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的第二式）。父亲只好另找门路，以北京“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②的名义按部中编审处布告审定图书之例，先行公布，时在1926年11月9日。“国语罗马字”正式由部令公布是在1928年9月26日。

父亲逝世后，蔡元培先生曾写挽诗悼念他，在此敬录于下：

① “数人会”本是北京的几个研究音韵学的人的联欢会，兼讨论音韵学的学理，1925年9月由刘复在赵元任家中发起。成员共六人：刘复、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这六人中，有五人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所组织的“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此会委员由国语统筹会主席在会员中指定。六人中只有刘复不是，因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议案是1923年提出的，那时刘复还在国外）。

② 北京“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是教育部属下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名义上属教育部，但所用人员都是聘请的，多半是各大学的专业人员，教育部也管不了。

挽钱玄同兄（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

理想高谈不讳狂，久于大学耀锋芒。古音善演余杭
绪，疑事重增东壁光。开示青年新道路，揄扬白话大文
章。可曾手定遗书目，堪与二刘旗鼓当。（君曾为刘申
叔、刘半农结集遗书，深望君之著作已有自定本。）

蔡先生的挽诗很可以概括先父一生的工作。挽诗的最后两
句，说的是先父生前未定所遗书目。至今，我们也没有弄清父亲
究竟留存了哪些篇章，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一位热爱中国的法国妇女

——何宜文夫人

万 永 光

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热爱中国的法国妇女，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她就是已故全国政协委员何思源先生的夫人、现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的母亲何宜文女士。

何宜文原名 Nathalie Yvonne Jammes，“何宜文”是她1928年加入中国籍时取的中国名字。她1905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Bordeove）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雷诺汽车公司工人，母早亡。1924年她在巴黎大学半工半读求学，结识了一些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如许德珩、劳君展、徐悲鸿、周炳霖、陈翰笙、童冠贤、段锡朋等人，独与何思源交往甚密。何思源也是个穷学生，出身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因学业成绩优异，得到山东省教育司（即后来的教育厅）的助学贷款和母校师长资助，升入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考取公费留美。他在留学期间极为勤奋刻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假期到农场劳动，又为中外报刊撰稿，因此手中有一些积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货币贬值，用美元到欧洲留学比较合算。他就在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于1922年自费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又

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济，还写了一本45万字的《国际经济政策》著作，出卖部分版权，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同何宜文志趣相投，逐渐成为情侣。1926年何思源回国，在广州参与筹建中山大学，任该校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长。翌年何宜文也来到中国，与何思源在上海结婚，并取得中国国籍，从此她就以中国人自居了。

何思源自1928年至1943年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他们夫妇在济南住了10年，生下两男两女。何夫人很快学会汉语，适应了中国生活方式，操持家务，教养子女，支持何思源的工作和事业。她平时不大参加社会活动，只是在1933年至1935年黄河三次决口，山东水灾严重，才走出家门，同山东妇女界姐妹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救灾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东，何思源以教育厅长兼任鲁北行署主任及游击指挥，组织部队在鲁北平原抗日打游击。因为何宜文是个外国人，四个孩子又太小(最大的8岁)，随军活动有困难，就把她和孩子安置在距鲁北较近的天津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英租界，她急忙迁入意租界，但也未能逃出日军魔掌，12月31日，日本宪兵勾结意租界工部局把她和四个孩子逮捕，押送鲁北惠民作为人质，并以南京汪伪政府部长或山东伪省长的职位为诱饵，欲逼何思源投降。还扬言：如不投降，就要对何部进行包围扫荡，并把何夫人母子放在队伍前面，何思源如开枪抵抗，就先打死自己的家属。同时，日本宪兵几次逼何夫人写信劝降，都被她拒绝。她怒斥日本宪兵：“你们打不了何思源，却拿妇女小孩出气，真卑鄙！”日本宪兵小队长威吓她也不为所动，充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